

变迁与交融 ——明代云南汉族 移民研究

陆 韧 / 著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变迁与交融

——明代

云南汉族 移民研究

陆韧 / 著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陆韧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8

I. 变... II. 陆... III. 汉族 - 移民 - 研究 - 云南省 - 明代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740 号

责任编辑：黄 琚 张丽剑 (特邀)

封面设计：向 炜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

陆 韧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265 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 - 5415 - 2017 - 9/K·75

定价：19.50 元

3156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总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1981年开始实施到现在，整整20年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专业点之一，也是当时云南省惟一的博士学位授权点。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应该归功于“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教授。创建一个博士学位培养点和授权点，关键在于有一位杰出的学术领导人。学术领导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师，而是导师们的导师。方国瑜教授在中国民族史、民族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云南地方史等领域，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作为学术领导人，具有学术权威诚然是先决条件，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正直的道德品行、独立的人格操守、高尚的学术品德，不追名逐利、不畏权惧势、不趋炎附势、不媚俗随时。做学问就是做人，做人过不了关，所做学问通常也难以经得起检验。方国瑜教授时常说：“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乃通过个人劳动，在已有基础上增益新知。”他信守的格言是：“不淹没前人，更胜过前人。”对于方国瑜教授，尊

重前人成果，严守学术规范，已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自觉的行动。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耕耘，不论乌云压城还是浊浪翻滚，不论党同伐异还是流言蜚语，他始终坚定不移、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奋力前行，终于成为一代宗师、一代昆仑。方国瑜教授在学术上的献身精神以及对本专业发自内心的挚爱，成为学子的楷模和表率；神圣的敬业精神和严正的学者风范铸造了他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少学子慕名投身他的门下。自他执教于云南大学以来，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几代学者，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中不少人已成为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学术领导人。

方国瑜教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办中国民族史教研室时，江应樑教授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诸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应樑教授原来是从从事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与教学的，他擅长田野研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德宏、凉山、西双版纳等民族地区做田野研究，写成《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文化生活》、《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等人类学（民族学）的传世之作。江应樑教授加盟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将人类学、社会学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和他自己从事田野研究的丰富经验带到民族史研究中，提出“人类学与民族研究的结合”的命题，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了新的贡献。五六十年代，他和方国瑜教授一起，培养了三届七位副博士（硕士）研究生。60 年代，他与方国瑜教授一起编写《中国民族史讲义》三大册。80 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工作。这套书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方国瑜逝世后，江

应樑教授成为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的领导人。他培养了十数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生现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成为新一代的专家、学者。

尤中教授 195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他从方国瑜的学生成为方国瑜的助手，进而成为蜚声中外的教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尤中教授在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的田野里勤勤恳恳地耕耘，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数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以骄人的成就，成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开创中国民族史专业，筚路蓝缕，备尝艰辛。在众人追赶热浪的时候他去自守“冷门”。尽管当时被人讥讽为“政治觉悟不高”、“白专典型”，他也置之不理，依然孜孜不倦地认真做学问，真正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他在《滇史论丛·自序——略述治学经历》中回首往事时，不无自豪地说：“1954 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材、出成果。乃于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方国瑜先生的《略述治学经历》是在 1980 年写成的。20 年过去了，薪尽火传，一代新人继承方国瑜先生的遗志，在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中坚持不懈地努力，取得了新的成果。从方国瑜培养中国第一个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开始到现在，云南大学已培养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三十余位。

这些研究生以方国瑜先生为榜样，潜心学术、淡泊名利，对所学专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并将这种感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强大动力。

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老一辈学者为云南省以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史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在云南学术史上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新一代的博士们，有比前人更好的社会条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理应做出更大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史学不是一门可以很快普及的学问，要入门不容易，登堂入室就更难，需要长时间的坚忍不拔的努力，需要百折不挠的精神，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需要清醒冷静的钻研。我毫不怀疑，新一代的博士们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在新世纪创造出无愧前人、无愧时代的新成果。

现在，我们从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论文中，选编一部分博士论文出版。这些论文，经过同行专家严格、认真的评审，并通过资深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现在，作者又作了修订。不是说，这些论文都已尽善尽美，但毫无疑问，这些论文都是同行专家们一致肯定的创新性成果，都遵循了方国瑜先生“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教诲。

这些博士论文出版时，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已不及见了。这些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方国瑜先生期盼的民族史研究的繁荣景象的确已经到来。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九泉有知，当感无限欣慰。他们也会鼓励我们：学无止境，应当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断进取。

林超民 谨识

2001年6月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提要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问题是云南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发掘新史料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从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汉族移民的土著化和移民对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探讨。

在上篇中，笔者以实证的方式，考订了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的类型、方式和数量等问题。认为明代进入云南的第一大类汉族移民是军事移民。论文对军事移民进入云南的时间、方式、组织形式、军籍管理制度及其人口的发展等作了细致考察。汉族军事移民第一代人口数约八十余万，是汉族移民的主流，主要在明代初期进入；明代中后期三征麓川和反对缅甸洞吾王朝侵扰时也有部分军队留屯云南，从而形成了一百二十余万人口的庞大的汉族军事移民。第二大类移民是罪徙移民，即贬谪安置或充军人口，终明一代都有大量的这类移民进入云南。对于这类移民进入云南的方式、分布定居的特点，论文都做了认真研究，但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依据，对其数量难以考说。第三类为民屯移民和自发式移民，主要有官府组织的民屯移民、因商而寓、因官而寓、因学而寓，以及内地人民逃避战乱和沉重的赋税负担而避居云南的移民，而且这类移民的数量相当巨大。笔者还对以往同类研究中一些学者通常引用的一些民屯移民和商屯移民史料

进行了认真地考辨和详细分析，认为先前学者们常用的沐英父子曾经迁移四百三十万民屯移民到云南这一史料的史实来源不可靠，不能成立。至于商屯移民，不能将全国普遍现象套用于云南，明代云南并不存在有规模的商屯移民。

关于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的数量问题，笔者对大量原始资料和史籍中的云南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除军事移民第一代人口外，其他各类移民的确切数量都无法考订。笔者通过对各类史籍记载的明代中后期云南赋役人口数的统计和分析，参证明朝制度，第一次比较客观、全面地估算了明代后期云南汉族人口数；研究了汉族移民在云南的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以往研究中忽略了沐庄隐含的汉族人口数；通过人地比的换算，首次考察了沐庄隐含汉族人口的情况；指出明代云南的汉移民主要由分属于都指挥使司的军事人口、布政司辖属的民户人口和沐庄隐含的汉族人口构成，约近三百万，使明代后期云南汉族人口的估算数更加接近客观实际。由此推论云南元代以前汉族人口比例很小；云南居民主要由当地世居民族构成的情况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到明末汉族人口已经超过云南当地民族人口，汉族已经成为云南各民族中最大的民族，云南的民族构成由此发生了划时代的变迁。

笔者认真讨论了汉族移民的土著化问题，认为汉族移民的土著化是他们与土地结合、与云南当地各民族交融中逐渐转变为云南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经历了镇戍定居、屯田生产的艰辛历程，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使自身实现了由流徙到定居，由悬浮于土地到获得或结合于土地，由外来客民到世居的云南人转变。他们的定居分布具

有中心城镇屯聚、内地坝区密集屯田定居、交通干线的驿堡屯戍并向次要道路和边远民族山区层层推进的态势，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云南主要由当地民族世居的状况。汉族移民广泛分布屯田，打破了云南当地民族原已存在的相当固定的民族地域，分割了世居当地民族的聚居地，在云南大多数地区普遍形成了汉夷杂居、汉夷共居，奠定了云南近代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而形成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族移民在云南的生产活动推动了明代云南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汉族移民广泛实施的封建地主经济对少数民族产生的重大影响，加速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封建化，摧毁了以封建领主经济为基础的土司制度，为明清云南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汉族移民在土著化过程中的阶级分化，不仅促进了云南地主经济的广泛发展，推动云南的社会变革，更重要的是汉族移民壮大了云南知识分子力量和人口基础，促进知识分子士绅阶层在明代云南社会中广泛兴起，标志着云南人口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对云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明代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促使云南汉族人口急剧增长，汉族从而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他们与当地民族一起生产生活，共同发展，形成了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推动着云南封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并冲击土司政治的经济基础。汉文化和儒学的广泛传播、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中华整体发展观深入各民族人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奠定云南更全面地实行一体统一政治的地域基础、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加快了云南社会与祖国内地整体发展的步伐。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Han people's immigration to Yunnan is a main subject of the historical studies about Yunnan in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author, by exploring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new investigative ways,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and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Han people's immigration to Yunnan, mingling with Yunnan aboriginal and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Yunnan.

In the thesis the author carefully and particularly studies the time and ways of the arrival of the Han troops and researches the organization form and military institution of army migration. The author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population of first army migration to Yunnan is about 800,000, serving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Han immigrants. Most of them entered Yunn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y resided and distributed here in the way of garrison troops, opening up wasteland and growing food grains. The second kind of immigration was the exile of criminals to Yunnan. There was a large population of this typ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also considers that the businessmen were conscribed in large numbers as farmers and moved to Yunnan to open up wasteland and grow food grains. When it comes to feudal official's transferring common people to Yunnan, historical data that Mu Ying and his son migrated

4,300,000 people to Yunnan was often quoted by some foregone scholars, yet the data is not reliable.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deny the fact of the immigration in the way of feudal official's transferring. There were large numbers of inland people immigrating to Yunn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or example, as officials appointed, businessmen, scholars and those to avoid wars and taxes. But there were not credi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decide the popul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can only us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taxed according to various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of the Ming Dynasty, referring to the institution of the Ming, and roughly estim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of the Han immigration to Yunnan at that time. The population of the Hans was about 3,000,000. It consisted of three parts — army migration population, the Han population governed by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an population within the Mus' control. It is the author that calcul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umber of the Hans who were implicated in the Mus' ruling area according to the rate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So the estimation approaches the fact proximate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Han nationality was the largest one in Yunna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ities in Yunnan changed adversel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carefully and seriously discusses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Han immigrants. Soon after they reached Yunnan, the Han immigrants became Yunnan people through garrisoning, opening up wasteland, growing food grains as well as settling down and combining with land. Their distribution shows that they concentrated on

main cities, then pushed forward to the mountain areas where minority ethnics lived. Consequently, the Hans and minority ethnics intermingled in terms of living spaces, which i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nowadays. The productivity labor of the Han immigrants pushed forward the social productivity of Yunnan.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migration of the Hans to Yunnan, the class polarization not only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lord economy but also speeded up the social changes of Yunnan. And in particular, the immigration of the Hans accelerated the rise of clerisy class, improved the population diathesis and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Yunnan society. All this stroke Tusi (土司) politics and helped in establishing the region base, economy base, thinking base and culture base for unification in politics.

绪 论

一 老题新做的思考

明代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代。在这个时代，云南社会的人口构成、民族分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文化趋向发生了划时代的历史变迁，深刻地影响了明清乃至近现代的云南社会，发轫了今天云南社会诸多特征，强化了云南与祖国内地一体化同步发展，开创了云南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从整体上看，明代云南不仅在云南地方史，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锻铸明代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特征的同时，也对明清以来中国统一发展进程、民族关系、疆域稳定和边疆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云南历史，就不能不关注明代。

社会变迁必需要有新的要素产生。新要素的产生是社会变迁的具体动因。一般情况下，导致社会变迁新要素的出现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积累从社会内部产生；二是从外部导入，对原来的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导入的外部要素通过与社会内因的共同作用，推动社会变革的发生。不可否认，明代云南社会变迁最大的新要素来自外部，即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人口的民族构成，形

成了明清乃至今天云南汉族人口占大多数、汉族社会成为云南社会主流的特征；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汉族移民，又在他们自身的土著化过程中，与当地各民族人民的交融中，带入新的社会、经济、文化诸因素，为云南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影响、改变了云南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云南的民族关系。

因此，关于明代云南汉族移民问题，众多专家学者都给予相当的注意，使该问题的研究成为经久不衰的热点。大凡研究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史、云南民族关系史，乃至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中国移民史以及经济史、边疆史、农业史、人口史的论著都辟有专章加以讨论，以此为主题的单篇论文就更多了^①。这些研究已经涉及了该问题的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面对如此强大的研究阵容和丰硕成果，我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一问题作为博士论文主攻方向呢？这是因为，当我细读相关论著时，一方面为几代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经过不懈努力而取得的研究成果而惊叹，受到教益和启迪；另一方面仍感到茫然和不足：问题的研究似乎停滞住了，停留在常见的史料上和泛泛的议论中，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探讨，议论多而实证少，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症结在史料上。如果没有新的史料发现和运用，不可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前进。但是对发生在距今五六百年前的大移民运动和云南社会历史的考察，利用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难以奏效。惟有用历史学

① 这一问题相关论著、论文情况，请参看本文末附录的参考文献。

的方法，进行严格的史料搜集、考订、分析、研究，辅以社会调查、历史计量学、人口学等方法，才能比较客观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有助于问题的基本解决。

那么现存史籍中保存的相关史料能支撑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吗？我们发现相关资料几乎都保存在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那些史籍中，只是因为这类史籍数量浩大，卷帙繁多，查找不易，条析更难。在这些史籍中，进行严谨的资料搜集考订，爬梳条析，发现新的史料，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是关键。为此我从资料入手，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再探讨。

对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考察，各部论著凡论及移民的方式、类型、数量时，无不以明代全国移民高潮中的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最普遍的形式统而论之。全国普遍推行的方式就一定在云南推行吗？明代云南社会与中原内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难道这种差异不曾影响明朝对云南汉族移民政策吗？换言之，云南是否存在着不同于内地的情况？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更不用说对明代云南汉族移民数量和人口发展状况考察，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没有量就很难准确地描述历史现象、解释历史过程、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①。尽管我国古代的史籍对数量的记载缺乏严谨性和系统性，给历史计量和统计带来了困难，但是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数量和汉族人口发展的数量，决定其对云南社会的影响程度。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只是利用史籍中几个分散的数据，仅作描述

^①（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著，王小宽译：《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性的推测，显然是不够的。为此，我注意到明代的史籍中，《明实录》是明朝官修的本朝的编年长编，3 054 卷，规模宏大，包罗有明一代的诏敕令旨、奏疏章牍、邸报传记，乃至全国和地方调兵遣将、移民兴废、迁民实边、置卫屯田、设官置署、官员调迁、充军流徙、立学建校、科举考试、赋税徭役、开发生产等等，举凡明朝一切应兴应革之事，都不遗余力网罗叙述，特别是引用了大量国家档案，保存了第一手珍贵史料。关于明朝对云南实施统治内容也不例外。故此书成为本文研究基本史料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明实录》卷帙浩繁，翻检不易，所幸的是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①，为我们利用《明实录》中相关云南的资料提供了方便。通过对《明实录》云南史料中汉族移民等资料的细致搜集和分析，我们从中发现了先前学者不曾注意和引用过的大量新的重要史料，参证《明史》、《明会典》、《国榷》、《明书》、《续文献通考》、《弇山堂别集》、《云南机务抄黄》等相关史籍和明清云南地方志的记载，已经能将明朝对云南统治政策的变化，移民的原因、历史条件、进程、方式、类型等重大问题理出个头绪，对长期争论的疑难问题进行考订。特别是对汉族移民中最重要的军事移民的进程、数量，以及移民的其他方式和明代后期云南汉族人口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查明了一些事实的真相；通过严肃细致考证和客观估算，得出一些更接近历史原貌的数据，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大

^① 徐文德先生的《明实录云南事迹纂要》，《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1963。